

目的论指导下的外事翻译策略与失误探讨

于芳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外事翻译的政治敏感性、时事性、纪律性使它有别于其它翻译。以翻译目的论的三个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为基础,探讨了外事翻译的策略及翻译中容易出现的失误。提出翻译主体的意图性、译文的可接受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在外事翻译策略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指出目的论在外事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受到作者的理解与表达、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此而产生的主要失误是语言性翻译失误和文化性翻译失误。

关键词: 翻译目的论; 外事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外事翻译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外事笔译和外事口译^[1]。外事翻译与科技翻译、新闻报道翻译、文学作品翻译不同,这一点在原作就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翻译时一定要使用合适的文体。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能否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由于外事翻译有着不可逾越的文化间隙,而目前的语言学界在外事翻译的问题上还缺少沟通,更缺少理论上的争鸣,这严重阻碍了外事翻译质量的提高,为了改进这一状况,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外事翻译中的理论支撑,并用实例分析了外事翻译的策略以及外事翻译中常见的失误。

1 外事翻译的目的与应遵守的法则

翻译目的论是从译文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一种解构主义理论模式,它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翻译的实用性。这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

向,即由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2]。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论认为: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对原文既可以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完全改写的方法,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翻译策略。而评价一篇译文的优劣,并非是看它对原文的等值程度(equivalence,包括功能等值),而是看它对于翻译目的的“适宜性”(adequacy),即是否有助于在译语情境中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法则: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连贯法则,指即译文在目的语文化背景及使用环境中对于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法则,即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既要忠诚于译语读者和翻译发起人,又要忠诚于原文作者,以达到两者间的平衡^[3]。在这三个原则中,目的原则被奉为第一准则,而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都要遵从于它,当发生矛盾时,以目的法则为准。

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

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活动的特殊性^[4]。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将翻译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本文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种统一,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

在外事翻译中,翻译目的可以指整体的翻译行为,也可以指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文,还可以指某一具体的翻译单位及适用的翻译策略。翻译目的为译者进行外事翻译行为提供了总的翻译指导原则,从整体上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目的。在外事翻译中,翻译要求建立于翻译目的基础之上,明确的翻译要求有助于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功能目的论提出的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译者较好地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实现外事翻译中的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要求。忠诚原则是外事翻译人员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翻译目的论为外事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翻译目的论指导下的外事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论理论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上。只要合理或必要,目的的概念可用来讨论某一译文的某个章节的某个翻译行为,而未必是指作为未分割的全文或整个翻译行为。根据目的论的三个法则,可以将翻译主体的意图性、译文的可接受性和文化的特殊性确定为决定外事翻译策略和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

1) 翻译主体的意图性

目的论要求翻译过程应以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它的预期功能为标准,也就是说,“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作为外事翻译主体,必须清楚其翻译的目的和意图。外事翻译是政治性翻译,译文除了要严格忠实于原文以外,在选择词语和

句式时,还要仔细推敲,要准确表达原文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翻译要做到文字和思想的统一。要做到这点,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结合业务熟悉政策,对于重要的词,特别是涉及到领土主权、重大国家利益的词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原文词意的深刻内涵。

例如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与英国就香港问题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即《中英联合声明》。在英文中不少词都能够表达出“声明”这个含义,如“statement”、“resolution – decision”等。但作为外事翻译主体,必须清楚其翻译的目的和意图,外事翻译强调翻译的程式化和庄严化,所以在翻译时可以采用的策略受到严格限制。《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一个简单的条约或者协议,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为了明确表达《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在意义及庄重性,选择的词汇是“Joint Declaration”。同样的道理,在《联合声明》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翻译上,中英双方有很大分歧。中方最初先提议用“re-cover sovereignty”,英方提议用“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很明显,由于翻译主体的不同,彼此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中方的翻译是“收回主权”,而英方的翻译是“主权移交”,而且由于不定冠词“a”有贬低“移交”的意义,因此英方的翻译是我方不能接受的。最后,经过我国法律专家的研究后,认为使用“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较为恰当,这一译文表明:我们国家以前对香港的主权,并不是“丧失”,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使”,现在则是重新“恢复行使主权”。可见,定稿后的译文就正确的反映了翻译主体的意图性。

2) 译文的可接受性

译文的可接受性指的是译文是否符合目的语的文化 and 体裁惯例,是否通俗易懂。可接受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外事翻译与文学翻译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调语言的优美而侧重于语言的可接受性及理解性。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翻译中应侧重于忠实和连贯:即要遵守外事翻译中的准确性及精确性、一致性及同一性、专业性和规范性原则。

例如1999年10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巴基斯坦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十分关注巴基斯坦的局势发展,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国翻译人员把这句话译成“We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and mak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it”。这样的翻译就不符合巴基斯坦的文化惯例。因此,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在新闻发布会后,立即要求中国政府做出澄清。因为“concerned”一词含有否定意思,即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某人对此表示“关注”。巴基斯坦大使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朋友”,中国政府不应该用与西方国家相同的词来表达态度。因此,将原文译成“*We have been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very closely and are waiti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则既能表明中国政府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又能够避免上述矛盾的产生。

3) 文化的特殊性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而且也是文化的翻译。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文化的特殊性是指在进行两种文化对比时,存在于一种文化而不存在于另一种文化的现象。外事翻译首先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5-6]。我们不仅要掌握语言的表面形式,还要熟悉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不尊重和不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熟练地运用贴近其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的英语语言,我们的传播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例如,央视国际网站有关中国新闻的一则报道:“Chinese leaders have joined noted intellectuals at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 event took pla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分析:对中国受众来说,没有必要对“Lantern Festival”加以说明,因为都知道这是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但这一点需要向外国受众说明,不然他们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与著名知识分子一起欢度这个节日呢?当然,在新闻里,不能提供太具体的背景知识,要恰到好处,呈现出最重要的信息。

建议“Chinese leaders have joined noted intellectuals at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 Lantern Festival, an important day for a family reunion, which marks the end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3 外事翻译中的主要失误

外事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本文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语言性翻译失误

这种失误主要包括语句型和语意型两种。前者如语法误解、单词误看、短语误识等等;后者如过度意译、断章取译、逻辑混乱等等。例如,1999年3月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译文:*I don't think my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ring me into a mine-field, but I do expect to encounter some hostile or some unfriendly atmosphere there.*该译文用了“bring into”和“I do expect to 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 entering*和*may really meet*则更贴切。改译:*I don't think my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s entering a minefield, but I may really meet with much hostility or unfriendliness there.*

2) 文化性翻译失误

与语言性失误相比,文化性翻译失误是一种宏观与具体层次上均存在的“功能性翻译失误”。目的论所说的文化性翻译失误指译文中与译语文化规范和惯例相冲突之处,在外事翻译中主要体现在术语的随译。例如: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提到的“外向型经济”就是指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因此译文可以是“*export-oriented economy*”,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外向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模式的经济,我国甚至在境外开设工厂来发展经济,因此“外向型经济”的词义已经扩大了,在翻译的时候也不应该再追求完全的直接对等翻译,译文应改成“*global-market-oriented economy*”。又如,对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译文“*the movement of five stresses, 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这就是一个存在失误的译文,很多外国人误解为“五个重点,四个美女,三个情人”。这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失误,直译导致了内容的歪曲,信息的损失,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可以采取补加译注或解释性的翻译,使原语内容准确传递给读者。改译为“*stress on decorum, manners, hygiene, discipline and morals; beauty of the mind, language,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love of the motherland, socialism and the Communist Party.*”对于这种中西文化差异以及汉语表达的浓厚中国特色带来的障碍,就要求译者具备娴熟的双语基本功和广博的文化知识,能根据上下文准确理解原文习俗语的喻义并加以变通,用符合译人语习惯的说法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翻译目的论在外事翻

译中的具体运用受到作者的理解与表达、文化的差异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此而选择的翻译策略是不尽相同的,同时也会因此而导致不同的翻译失误。本文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外事翻译中的理论支撑,以期与语言学界的同行争鸣,并对提高外事翻译的质量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 [1] 涂和平. 外事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J]. 上海翻译, 2005 (3): 37-39.
- [2] 郜万伟, 田翠芸. 翻译目的论—松开译者脚下之链[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4): 145-147.
- [3] 尹延安. 目的论在法学著述翻译中的运用[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6(2): 103-105.
- [4] 王霄凌. 论外事翻译的特点[J]. 济南大学学报, 2002, 12(5): 49-50.
- [5] 苏长. 艳政治经济习俗语的形象翻译[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2): 62-64.
- [6] 孙艳, 杨惠丽. 浅谈政论文翻译[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2(6): 42-44.

Discussion on Foreign Affair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Faults Based on Skopostheory

YU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Foreign affairs trans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nslations because of its some special properties, such as political sensitiveness, topicality and discipline. The select strategy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of foreign affairs translation are discussed based on Skopostheory which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three rules, the intent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acceptability and cultural particularity. In this paper, the intention of translator,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civilization are thought to play important role on the select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Skopostheory may be restri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fault and culture fault.

Key words: Skopostheory; foreign affair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 周尚超)